



严春宝
编译

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由海南师范大学资助出版

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

严春宝 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文庆儒学文选译注/严春宝编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161 - 4755 - 9

I. ①林… II. ①严… III. ①林文庆(1890~1931) —儒学—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632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顾世宝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3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杜维明先生序

林文庆：一个会说英语的儒家

多年以来，我一直很关注鲁迅与林文庆两位先生的关系，他们代表两个不同的思想方向，彼此摩擦出了思想的火花。我们面对中西文化，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可能有什么样的期待？在现代中国的文化中，西学的分量非常重；而传统文化，正在慢慢地恢复，虽不能说是一种遥远的回响，但声音确实是相当的微弱。在这样的氛围下，传统文化被边缘化了。不仅是儒家的传统，也包括国学。在西学的背景下，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每个人受到西学的影响是远远超过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的。从西化背景来看国学，我们如何来理解林文庆？还有辜鸿铭？辜鸿铭的背景与林文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主要在苏格兰的爱丁堡留学，而且跟卡莱尔——西方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学习，他到中国以前英文已经很熟练了。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他留辫子，成了一个保守主义的代表，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西化派形成鲜明的对比。林文庆也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回返新加坡后，却大力提倡儒教，将儒学当作一种宗教的现象。我们想一想，他是“峇峇”^①，完全是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人。但他既不是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因为受到英国人的欺侮，而是通过自己的文化自觉去寻找中国文化的，通过精华典籍（诸如《左传》等很难读的经典，且都是用很典雅的英文进行翻译的）去寻找中国文化，这与辜鸿铭的文化寻根很相似。

五四以后出现了一个大的潮流，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潮流最大的影

^① 所谓“峇峇（BaBa）”，指17世纪以来居住在马来群岛的华人移民后裔。峇峇一词多数时候是指这一特定的族群，但有时候又特指该族群中的男性，女性则称为“娘惹（Nyonyas）”。

响力当然是鲁迅，当然是陈独秀，当然是胡适。这个潮流有非常大的价值和深刻的意义。但是，从民族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假如我们不能把传统文化非常深刻的价值，像林文庆和辜鸿铭等所代表的，加以发展，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林文庆受英文教育，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回到新加坡后积极推动儒学运动。我认为，在讨论林文庆的这些社会活动时，他的英文背景相对于儒学的华文根源，格外有意义。我和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1982年与李光耀总理见面，被问到儒家文明到底能不能用英文讲清楚时，我们几乎同时给出了恰恰相反的答案：余英时认为不行，而我认为可以。我的逻辑是假如可以不通过希伯来文而了解《圣经》的意义，假如可以不通过梵文而了解佛教，假如可以不通过阿拉伯文而了解《古兰经》，就表示世界这三大宗教是全人类的，不仅是地域的。能不能够用英文，可以说是对儒家传统本身的考验，也与英文世界能不能够从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中得到一些参照和资源，有密切关系。林文庆在新加坡推广儒学的实践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和教育史中，林文庆和鲁迅之间的争执众说纷纭、评价不一。实际上，从某种角度看，林文庆是一个边缘人。虽然他和鲁迅之间有些矛盾，鲁迅把他描述成英籍、土生、华人孔教徒，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从鲁迅的描述来了解他，也会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价值。

首先，正因为林文庆是海外华人，他心里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情结。我时常觉得，在中国生长的学人是很难深入了解海外华人所碰到的困境。

其次，林文庆是让我们心灵开放的他者。孔教徒在鲁迅年代的气氛里，是落伍的、保守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反动的。但我认为，今天重新来看，林文庆是一个他者，要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圈中了解这一现象。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有一个观念，就是面对极端的他者，是我们心灵的解放。正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他者，假如我们的心灵不是封闭的，是可以因此而开放的。林文庆这样一个现象，对我们所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是心灵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

我认为，林文庆具有强烈的乡土根源性。因为林文庆是峇峇，他具有乡土的根源性，但又不是封闭的，可以在新加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也可以认同厦门，在鼓浪屿安居乐业。我相信，如果能见到他的人，一定会认



为他很宽和、内心很平静，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一定有他的方向性。不像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急躁、异化、愤恨，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有些情绪完全是不合理的。

林文庆所提倡的尊孔读经，和现在中华文化新的复兴氛围相契合。在我看来，林文庆是一个会说英语的孔教徒，或者是一个会说英语的儒家。他代表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他的文化自觉，和他作为英国公民的身份，是没有矛盾的。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面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很多中国的学者对此有误会，认为你们在国外，总是把它看得很美，却不知道这个文化在我们的土地上曾经多么“龌龊”。对此，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国外要了解中华文化，是要有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的，而没有文化自觉的人是占多数的，因此林文庆的所作所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觉得，像林文庆这样一个现象，对我们所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是心灵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从文化交融与文明交往的角度来看，我以为，可以将林文庆视为一座连接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桥梁。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密切，因而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愈加突出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解读、检视一下林文庆在百多年前对于儒学的诠释与说明。

是为序。

杜維明

编译者序

关于本书的由来

笔者于2007至2009年，在厦门大学跟随曾玲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厦大私立时期的校长林文庆博士，故而曾经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厦大图书馆中搜集有关林文庆的文献史料，将图书馆中现存私立时期的《厦大周刊》、《厦大校刊》及各种纪念特刊中凡是涉及林文庆的内容几乎全部做了复制，以供研究之需，其中包括林文庆的大量演讲报告、开学式训词及各种场合的讲话，等等。我感到很幸运也很内疚的是：那时的厦大图书馆对于这些旧报刊资料的使用还没有加以任何限制，完全允许自助复印！这当然为我的资料搜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省却了手工抄写的麻烦、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任何复制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会对这些旧报刊资料造成一定的损伤。为了尽可能降低对这些旧报刊资料的伤害，我准备了无数的细小纸条，将需要复印的部分夹在中间，以避免折叠这些原本就已经相当脆弱的旧报刊。尽管如此，我相信还是不可避免地给这些旧报刊带来了一定的伤害。对此，唯有自我安慰：等将来有机会了，一定想办法将这些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以惠及更多研究者，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些珍贵资料的作用！

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在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两年研究生涯后，我不得不出站了。当时，合作导师曾玲教授很想让我留在厦大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对此我自然也是梦寐以求。为此，曾老师曾先后拜托过很多人帮忙，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结果。2009年3月，完全不了解内情的我，带着自己精心设计的厚厚一大叠个人简历，信心满满也可以说是满怀希望地去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博



士后人才招聘会。结果，在招聘会上转了一圈后，我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很傻、很天真！我毕恭毕敬地递送出去了几十份个人简历，结果除了收到北京市海淀区旅游局打给我一个邀请参加挂职锻炼的电话（且明言：只是挂职锻炼而已，他们无能力，也无法解决实际工作问题）之外，其他的个人简历，最终都泥牛入海不知所踪了。

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还没改现名，仍为旧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做了近两个月颇为愉快的实习编辑之后，最终还是因个人家庭等原因不得不选择了离开。5月份，我从北京撤返厦大，试图为留在厦大作最后一搏：第一次前往人文学院办公室拜访院长周宁教授！因为在京期间始得知，原来周教授跟我大哥是朋友，所以希望他能对我的工作有所关照。我至今依然能清晰记得在周教授办公室谈话的情形：周教授对我非常热心，在详细了解我的个人情况后，还进一步帮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最后，他实事求是地说，形势很不乐观！盖因当时的厦大规定：学校引进的讲师人选年龄不能超过35岁，引进的副教授人选不能超过40岁，而当时的我，不仅没有任何职称，且即将在平淡中悄然迎来我人生中的第43个生日！虽然周教授还不肯轻言放弃希望，想再作一番努力，但我却深知其中的难处，而且因为我们彼此间谈得特别投机，虽说是初次见面，但给我的感觉却像是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因此，我不想让周教授过于为难，就主动提出了放弃留在厦大的想法。之后，我们转而谈论学术研究，很自然地，话题就转到了对林文庆的研究方面。当周教授听说我在研究林文庆时，就跟我说：为了庆祝厦门大学成立90周年，厦大准备筹划出版一套大型丛书，挑选一批跟厦大密切相关的学者，为他们每个人出版一本文集。林文庆作为厦大私立16年期间的“唯一”校长，我们责无旁贷应该为其出版一本文集。我当时立刻想到的就是我在厦大图书馆中复印的林文庆的那些文章、讲话、报告，等等。在不经意间，事情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我们还商定了编选的原则，甚至是书的规模：因为受出版经费的制约，这本设想中的文集，字数被限定在20万字左右。现在，这本书虽延宕已久，但终于得以出版面世，我以为周宁教授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当初他埋下的那颗种子，恐怕就不会有今天这本书的诞生。

之后，我在无奈中恋恋不舍地告别厦门大学，前往被称为“南方之南”、孤悬海外、自古被视为放逐之地的海南岛，在海南师范大学继续从事我的研究生涯。虽然离开了厦大，但2009年5月在厦大人文学院办公

室中，我和周宁教授彼此之间的这份承诺，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我开始将收集到的林文庆以中文发表的所有著述、讲话、报告等资料，一一加以整理，然后再录入电脑中，总共得到了十余万字。仅凭这些出版一部文集，显然不够分量，于是，我又将目光重新转到了新加坡，想从林文庆的众多英文著述中寻求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以弥补文集分量上的不足。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我选取了最能代表林文庆儒学思想的 10 篇英文文章。从 1904 年开始，林文庆在他与宋旺相合作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上陆续发表了多篇论述儒家思想的文章，如《儒家的天道观》、《儒家的人性观》、《儒家的伦理基础》、《儒家的孝道观》、《儒家的祭拜仪式》、《儒家的理想》、《儒家的兄弟观》、《儒家社会中妇女的身份地位》、《儒家的婚姻观》以及《儒家的交友之道》等一系列文章，可以说是从多个方面较为详细、集中、系统地阐释了自己对于儒家的基本观点。由于《海峡华人杂志》属于稀有文献资料，所以它的收藏者——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不允许翻阅，自然更不允许复印其原件，图书馆所能提供的服务就只有缩微胶卷以供阅读了。之后，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11 楼那昏暗的缩微胶卷阅览室里，就开始了后来始知实为“非法偷拍”的历程。由于文章太多，而我又只能利用学校假期南返回家时才能前往图书馆中查阅资料，因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缩微胶卷阅览室里进行文章的抄录，于是我就将缩微胶卷的投影一页一页地拍摄下来，然后带回家拷贝在电脑上，再对着这些照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将 10 篇文章逐一敲入电脑中。后来在一次“例行”的拍照过程中，不巧被图书馆一个正在巡视的马来族女职员发现了，她对我的行为显然很是不满，叽里呱啦地对着我嚷了老半天，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她的话，但我终于明白：原来我一直自视为光明正大的拍照行为，竟然是不合乎图书馆有关规定的，因而，我以往的所有拍照活动，实际上都属于非法的“偷拍”！虽然明知这不合规定，但为了收集更多有关林文庆的资料，我后来还是“知法犯法”，又陆续“偷拍”了好多次。我自然知道“偷拍”是一种不甚光彩的行为，但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偷拍”行为只是不合乎规定而已，“偷拍”的对象毕竟不是人，尤其不是天生敏感的美女！只是近乎被人们遗忘了的林文庆著作罢了，而且也不会给缩微胶卷本身或任何人带来任何的伤害，因为我所“偷拍”的对象，实际上只是缩微胶卷经聚光灯后投射出来的“影子”而已。

就这样，在有惊无险的大费周章之后，终于将林文庆的 10 篇英文稿

收齐了，补充进原有的文稿中，编成了一本 20 万字左右的《林文庆文集》。事情至此本以为已大功告成，就差交付出版社出版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将《林文庆文集》编订完毕之后，我却从别的渠道得知，厦大并没有筹集到足够的出版经费，周宁教授原本设计的丛书出版计划自然也就泡汤了。在得知这一信息之后，为了不让周宁教授感到为难，我没有再跟他联络或以任何方式谈起出版《林文庆文集》的事。

虽然历经两年编订的《林文庆文集》未能如愿出版，但在编选《文集》的过程中，我却还是获益颇丰：我对林文庆及其儒学思想的认识更加深入，也更加全面了，而且我愈发感到，仅仅编订出版一本文集是不够的。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更新、更大胆的想法：应该编纂出版《林文庆全集》！有所想法就要有所行动，之后，我如“祥林嫂”般的逢人便说，开始了四处宣扬编纂出版《林文庆全集》的游说活动。可惜的是，“说者有心”，无奈“听者无意”，闻者大多木然没有任何反应，就算偶尔有个别人士在口头上表达了理解、支持之意，但始终不见任何具有实质性的行动，一切竟如同古巴比伦人的那座塔，一直停留于半空中。

2011 年春节期间，我回新加坡过年，偶遇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龙先生，事情才开始有所改观。我与郭会长的相识，缘起于我之前撰写林文庆的传记著作《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当时，出版社希望我尽可能多找一些关于林文庆的照片，以便增加书的可读性。我知道南洋孔教会有几张林文庆的照片，因此特意写信请朋友转交给郭会长，希望他能授权让我使用这些照片。郭会长很快就给我回信，完全同意我在书中使用这些照片。为表示感谢，我特意在该书的后记中对郭会长的慷慨授权表达了谢意。然而，很不幸的是，由于我个人莫名其妙的疏忽大意，竟然在后记的感谢词中，将郭会长的尊讳大名写错了：郭文龙变成了郭金龙！而我自己对此一直浑然不知，直到 2011 年春节期间，在初次拜会郭文龙会长并赠送书籍给他的时候，才由郭会长本人亲自给我指出了这一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于我的这一错误，郭会长倒是极为大度，完全不在意我把他的名字写错了，反倒是念念不忘提醒我，让我将来有机会修订再版这本书的时候，记得将书中的其他几处小错误予以改正！由于《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一书的再版目前来看仍遥遥无期，因此，唯有借此机会先行向郭文龙会长表达歉意！

郭文龙会长对于编纂出版《林文庆全集》这一想法，当即给予了毫

无保留的全力支持，甚至还为此专门于2011年11月底前往厦门大学，与学校有关部门进行了商谈，力促由南洋孔教会与厦大合作，早日启动《林文庆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在积极筹划和支持《林文庆全集》出版计划的同时，郭文龙会长也关注着我对《林文庆文集》编订的进展，并决定以南洋孔教会的名义资助这本书进一步的研究。而正是2011年春节期间郭会长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再次延缓了《林文庆文集》一书的出版计划。由于林文庆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要表述，很多都是以英文完成的，为了便于不谙英文的读者和研究者全面了解林文庆的儒学思想，郭会长建议：应该将林文庆有关儒家思想的论述翻译成中文！对此，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2011年春节过后，我就着手翻译工作，在时断时续经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到2012年春节期间，方将林文庆论述儒家思想的10篇文章全部翻译完毕。文章译完后，又承蒙郭文龙会长牵线搭桥，使我有幸结识新加坡国立大学英语语言交流中心高级讲师吴恩慈博士（Dr. Ng En Tzu, Mary），吴博士于百忙之中抽空审校了其中的部分篇章，对此，笔者深表谢意！除吴博士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严寿澂教授和南洋孔教会的张静小姐，也曾分别对本书中部分章节的译文进行过校译，特表谢意！当然了，文责自负，如果读者感觉译文较好，那自然是因有了吴博士等人的生花妙笔之故；如果读者感觉译文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则皆由笔者翻译功力不足所致，非关吴博士等人事也。

就南洋孔教会郭文龙会长对《林文庆文集》的编译及出版诸事所提供的帮助而言，显然绝非一个简单的“谢”字可以交代清楚的。郭会长不止一次地对笔者说：林文庆是南洋孔教会和厦门大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作为曾经受惠于林文庆的两个组织机构，南洋孔教会和厦门大学都有责任和义务帮林文庆做一点儿事情。也就是说，郭会长之所以要支持《林文庆文集》乃至《林文庆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除了继承和发扬光大林文庆的儒学思想以有益于今人的思想进步之外，也是出于道义上的感恩之心和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使命感。面对如此宽广的胸襟，我觉得自己作为《林文庆文集》的编译者，如果不能代表《林文庆文集》一书的所有读者和受益者向郭会长说一声“谢谢”的话，那么，作为我个人的一声谢语，显然是无足轻重的，因而，不说也罢。

以上所述，即为《林文庆文集》的编译始末，或曰该书诞生的前因后果。

关于本书的编译原则

笔者在2009年最初与周宁教授讨论编订《林文庆文集》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强调林文庆的儒学思想，而是首先考虑到这本书的主要受众将是一般的国内研究者和读者，因而，文集首先收入的就是林文庆以中文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报告。及至后来发现仅仅依靠这些中文文稿，并不足以形成一部有分量的文集的时候，才开始全面考虑文章的筛选范围。考虑到研究、宣扬和实践儒家思想是林文庆信守终生的事业，也是他在主政厦大期间教育厦大学子的主要理论依据，而将厦大学子培养成“止于至善”的仁人君子，更是林文庆提倡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最终决定将文集的编选目标集中在林文庆的儒学教育思想方面。虽然最终选入文集的有些中文文稿，从表面上看未必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但考虑到林文庆广博的学识背景和其独特的儒学思想特点，亦酌情予以收录。

至于英文译文方面，则相对简单。文集中选译了最能体现和代表林文庆儒学思想的10篇文章和林文庆专著《从儒家观点看世界大战》中的部分章节。文集中所收文章的编排次序，除中、英译文稿分开编排外，每一部分的文稿又是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的。采用这样的编排方式，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全面了解、认识林文庆儒学思想的演进脉络。

此外，鉴于林文庆本人在厦门大学期间，从不向外人谈及他个人在新加坡时原本享有的崇高社会、政治地位及其在经济领域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更不会谈及他自己对厦大的重大贡献、无私付出等种种牺牲，反而时时刻刻提醒厦大的莘莘学子，不要忘记了校主陈嘉庚对于厦大的贡献，因而厦大学人一直无法完整了解林文庆放弃新加坡如日中天的事业、前往厦门大学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为了让读者全面、深刻地领会林文庆为厦大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在本书的最后，特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当年陪同林文庆前往南洋募捐的傅文楷、曾郭棠两位时人的演讲报告，这也是目前仅见的、正面叙述林文庆对厦大所作贡献和牺牲的两篇文章。

在文章的编排方面，虽然林文庆的文章中，某些词语的运用甚至是用词习惯会与今天稍有不同，但为了尽可能保持林文庆文章的原貌，除非是特别明显的错误在后面用括号予以说明外，一般不影响理解的字词等皆不予更正或说明。

至于这样的编订方式是否得当，还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供将来编纂《林文庆全集》的时候作参考，因为说到底，笔者编译《林文庆文集》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它的出版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以推动《林文庆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

关于林文庆所代表的一种社会现象

说林文庆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依据的。林文庆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领导、发动了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革运动，虽然这些运动一开始主要是针对峇峇华人社会的，但后来亦逐渐地延伸到了移民华人社会中。就峇峇华人社会而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因逐渐西化兼马来化而背离华人文化传统日渐远去的峇峇华人重新回归中华文化的怀抱，因而，后人将之称为一次华人的再华化运动（Re-Sinicization）。

说起峇峇华人的再华化，林文庆肯定不是第一人，因为与林文庆同一时代、年龄比他大12岁的辜鸿铭，就是一个峇峇再华化的典型例子。但与林文庆比较起来，我们只能说辜鸿铭所代表的只是一个个案，而林文庆却代表了一种现象。其理由就在于，从现有资料来看，辜鸿铭的回归中国与中华文化，单纯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他并没有因此而影响或带动更多的人像他一样回归中华文化。林文庆则明显不同，他不仅自己彻底回归儒家传统，而且还以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带动了身边的一大批人跟随他一起回归中华文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出生于槟城的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人物、有“防疫斗士”之称的伍连德博士（Dr. Wu Lien-Teh, 1879—1960），出生于印尼、享有“复旦大学的保姆”称号、被陈望道誉为“复旦传统的象征”的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博士（Dr. Lee Teng-Hui, 1873—1947），以及出生于马六甲、曾担任袁世凯翻译和总统图书馆馆长的孔天增（Kung Tien-Cheng, 1879—1915），他们都是在林文庆的直接影响下回归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三人当中，除孔天增因英年早逝对中国影响甚微之外，伍连德博士和李登辉博士都长期在中国服务，他们分别对中国的医学和大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林文庆而发酵、引发的这一连串华人再华化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新加坡英文报章《海峡时报》的不满和批评，甚至有人因此而质疑女皇



奖学金是否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因为由海峡殖民地提供奖学金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不是留在殖民地为当地政府和人民服务，而是在林文庆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个个跑到中国去为他们的祖国服务、作贡献去了。为此，作为林文庆好友的陈嘉庚还特意出面替他辩护，说林文庆回归中国并为中国服务的本意，是“不敢违背本坡政府官费生之主义，尽政府培养优秀分子，莫非希望他日成才，为大规模之救人且无界限地方种族”^①。

主要是由林文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整个南洋地区所发起的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为当时已经日渐成形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出现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作为铺垫，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出现和高涨，就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毫无疑问，林文庆正是点燃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这把熊熊火炬的最重要的先驱人物之一：当“中国的民族主义横扫整个的海峡殖民地，而他（林文庆）就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人”^②。

就此而言，如果我们说林文庆所代表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是近现代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崛起的一个前奏，应该不算是过分。

关于林文庆研究的现状

在《林文庆文集》的开篇中讨论和叙述林文庆研究的现状，这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件不怎么合乎时宜的事情，但也并非全然多余。笔者于2010年出版了海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新加坡土生华人、厦门大学私立时期校长林文庆博士生平的大型学术性传记著作《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自出版以来已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及众多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除入选《中华读书报》“2010年度图书之100佳”外，还受到了新加坡广播电台（新传媒属下958城市频道，2011年7月26、30日）和凤凰卫视中文台（2012年5月22、23日）的推荐。由此可见，林文庆的传奇一生和其非凡事迹，即使是在今天，也还是很有感染力的。伴随着该书在社会上的影响持续扩大，使一些

① 《陈嘉庚先生在中华俱乐部欢迎林文庆先生之演说词（一）》，新加坡《南洋商报》1926年2月1日。

② 《林文庆传》，该小册子除封面下署“林文庆博士诞生百年纪念刊”字样外，无其他出版信息，第47页。

学者逐渐产生了想进一步了解、认识乃至研究林文庆的兴趣。拙作出版后，就曾有“朋友”“善意”地提醒：为何在该书中没有出现关于林文庆研究现状的说明？这样做是否有些不太合乎“学术规范”的要求？显而易见，由于不同的人对于“学术规范”有着不尽完全相同的理解，故而产生了误解和歧见。事实上，按照本人对于“学术规范”的理解，作为学术性传记著作，当然是以人立传，所有传主的生平事迹、一举一动乃至传主的喜怒哀乐，才是应该重点记录和叙述的核心成分，而有关传主的所有资料、研究者的观点、看法及研究成果等，都只是撰写传记时必需的辅助材料和依据。传记作者虽然对众多甚至有些杂乱无章的文献史料享有选择权，但在撰写的过程中，必须以“述而不作”作为最高原则。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向读者完整地呈现出传主那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丰满形象。笔者以为，这应该也是撰写学术性传记著作时大家都要遵循的一般性原则。因此，为了尽可能在学术的严肃性和人物传记的趣味性之间取得平衡，笔者在撰写《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时，尽可能地舍弃了与林文庆生平事迹关系不大或无关紧要的一些内容。如此一来，关于林文庆研究现状的说明毫无疑问就是多余的了：试想一下，如果在阅读林文庆的生平事迹之前，先要读者花费相当的气力去了解当下学术界关于林文庆研究的观点或者争议，岂不是大有喧宾夺主之嫌？甚至成为一桩大怪事？一般读者之所以选择阅读林文庆的传记，相信是为林文庆博士那富有传奇性的曲折人生所吸引，而并非对学者们研究林文庆的那些枯燥的学术争论感兴趣：这个世界上，并非人人都可以或愿意成为专家、教授！当然了，如果有人因阅读了林文庆的传记进而产生想要研究林文庆的欲望，那么，接下来应该阅读和研究的，自然就是眼下这本资料性的《林文庆文集》或设想中的《林文庆全集》了。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林文庆文集》，作为一本资料性的史料汇编，主要是为有兴趣进一步研究林文庆的学者们服务的，为了让有意加入到林文庆研究行列中的学者全面了解和把握林文庆研究的前沿问题，以便尽快进入研究状态，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对林文庆研究的现状作一个概括性的说明。

由于受历史、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基本上不存在针对林文庆的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有关林文庆的学术研究，主要来自海外，而且集中于新加坡。在新加坡，林文庆作为一个时代的东南

亚闻人，关于他的文章真的不算少，但早期的那些文章，大都是一些简短的人物传记或回忆性的纪念文章，基本上没有展开学术性的探讨。对于林文庆研究较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首推陈育崧的《林文庆论》一文（新加坡《南洋学报》第19卷第1、2辑合辑，1965年）。海外华人史家颜清湟在其专著中亦曾涉及对林文庆的研究（《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孔教复兴运动》，《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此外，叶钟铃（《鲁迅和林文庆在厦大的一场冲突》，新加坡《人文与社会科学论文集》1984年第4期；《林文庆、邱菽园与华人好学会（1896—1905）》，新加坡《亚洲文化》2003年第27期；《林文庆是一位反基督教分子？——1896年英华学校传教事件的探讨》，新加坡《亚洲文化》2007年第31期）和毕观华（《林文庆》，《怡和轩俱乐部九十周年纪念特刊（1895—1985）》，新加坡大水牛出版机构，1985年）也先后对林文庆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至于对林文庆生平展开较为系统研究的著作则当推《林文庆传》这本小册子，该书署名为“林文庆博士诞生百年纪念刊”，除此之外并无更多出版信息，但据林文庆研究专家李元瑾博士考证，该书实际上系新加坡前马来亚大学 Khor, Eng Hee 未发表学位论文的中文译本（Khor, Eng Hee: “*The public life of Dr. Lim Boon Keng*”,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8）。

真正对林文庆展开学术层面上的探讨研究、对林文庆研究贡献最大、最突出的专家，则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李元瑾博士莫属。李博士对林文庆的研究，最早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她还在南洋大学求学期间，就开始了对林文庆的研究。1971年，李博士完成了她的荣誉学士学位论文《林文庆与邱菽园：马来亚华族社会的两个改良主义者》；1974年，李博士又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1年正式出版）。1998年，李博士进一步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1年正式出版），以较为宽广的视角，对林文庆展开了比较性研究。除上述外，李博士还先后撰写、发表了数篇直接、间接涉及林文庆的重要论文，如《林文庆的儒家思想》（《亚洲文化》1987年第10期）、《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新加坡“东南亚华人文化、经济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1994年）、《林文庆走向厦

门大学：一个新加坡海峡华人的寻根之路》（新加坡《南洋学报》1998年第52卷）、《新马儒教运动（1894—1911）的现代意义：以1980年代新加坡儒学运动验证之》（载李元瑾主编《南大学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1年）以及《林文庆：中华文化复兴者与现代教育家》（载何国忠主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3年），等等。李博士的最新成就，是编纂了《东西穿梭 南北往返：林文庆的厦大情缘》一书（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09年），书中收入了杜维明教授、梁元生教授、何国忠博士、颜清湟教授等人以及李博士本人研究林文庆的最新研究成果。

李博士的上述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界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真正从学术层面上揭开了研究林文庆的序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元瑾博士对林文庆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停留和局限于纯学术层面上的探讨，而是能以历史学家的良知，勇于“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当李博士最初于1995年5月访问厦门大学时，因在厦大“宽敞的校园里，找不到一砖一瓦可以凭吊林文庆”、“校园内不见任何纪念文物，哪怕仅仅一张墙角照片或一间斗室”而心绪惆怅、感慨万千。李博士回到新加坡后，即以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奋笔疾书，写下了万字长文《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投书《联合早报》。7月间，《联合早报》在“根”版上以连续三个星期日，图文并茂地整版刊出了李博士的长文，分别从林文庆选择出掌厦大校长的原因、离开新加坡前往厦大后林文庆个人的付出与牺牲，以及陈嘉庚对他的评价、林文庆与鲁迅之间的矛盾、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林文庆被迫出任“华侨协会”会长的由来和作为、新加坡人对此事的看法等各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林文庆对厦大的贡献、林文庆的思想及人格，等等。^① 李元瑾博士的这一系列工作，对于最终改变厦门大学校方原本对林文庆所持的冷漠态度和重新认识、评价林文庆对于厦大的贡献，可谓是至关重要。在李博士的一再努力下，厦大最终于2005年为林文庆修建了文庆亭，其后，又于2008年在文庆亭的左侧竖立起了林文庆的雕像。

林文庆作为厦门大学私立时期“唯一”的“创校”校长，其身影曾

^① 有关详情，参见李元瑾编著《东西穿梭 南北往返：林文庆的厦大情缘》，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09年。

